

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 40 年的中国模式^{*}

宋乃庆 罗士琰 王晓杰

摘 要 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国模式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却颇有争议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义务教育中的体现,是指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中国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相对稳定、比较成熟的发展路子,其内涵包括政府主导、分级管理,协同一致、合力攻坚,实事求是、渐进变革,并呈现出历史性与时代性兼具、特殊性与普遍性并行、稳定性与发展性共存的特征。回顾 40 年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程,我国义务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探索解决了“穷国办大教育”的世界性难题,用 25 年时间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壮举,义务教育总体发展水平正逐步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反思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国模式,应继续将义务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大教育投入、促进均衡发展,完善义务教育配套法律法规、依法治教,深化并落实公平与质量并重的发展理念,转变政府职能、构建现代学校治理制度。

关键词 改革开放 40 年;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国模式

中图分类号 G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8)09-0025-06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8.09.004

作者简介 宋乃庆,西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导,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 重庆 400715;罗士琰,西南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生 重庆 400715;王晓杰,西南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生 重庆 400715

义务教育是提升国民素质、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奠基性工程,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掀开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序幕,也掀开了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纪元。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历程,伴随着初等教育的普及与发展,义务教育规模由小变大、质量由低变高、影响力由弱变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解决了“穷国办大教育”的世界性难题,全面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整体发展水平正逐步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义务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时期,综合考虑影响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提炼义务教

育改革与发展中国模式,总结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成就和经验,有利于进一步拓宽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格局,为世界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对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这也是一种积极的理论探索。

一、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国模式的内涵

厘清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国模式的内涵是深入探讨这一模式的前提。“模式”一词在经济学上使用比较广泛,《辞海》解释为“可以作为范本、模本、变本的式样”,《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探索出了一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义务教育质量关键影响因素监测框架构建与验证研究”(16ZDA229)、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项目“中国义务教育发展报告”(11JBG018)、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重大成果培育性项目资助(2018-06-002-BZPK01)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SWU1709505)的阶段性成果。

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人类迈向现代化作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独特贡献,并形成了时下热议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中国模式问题,他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模式,要由自己去探索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模式。^①2004年美国经济学家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北京共识”以来,“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成为学界的重要关注点。学界对“中国模式”颇有争议,对其内涵的总结各有侧重,有的强调发展道路或经验^②,有的强调发展理念^③,有的侧重于意识形态角度^④,有的则侧重于社会发展角度。^⑤倡言“中国模式”并非妄自尊大,而是强调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有别于外国的特殊性,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相对确定的发展经验,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具有推广和借鉴价值。^⑥基于此,本文认为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义务教育中的体现,是指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相对稳定、比较成熟的发展路子。可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 政府主导,分级管理

中央政府领导下实行分级管理是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国模式的重要特色。我国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级统筹规划、县级具体实施的管理体制,政府的责任分担贯穿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始终。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统领整个中国义务教育的发展;省级政府是地方最高行政机关,对义务教育负有首要责任,负责统筹和组织协调省内义务教育工作;县级政府对本地区义务教育发展负有主要责任,因地制宜具体负责义务教育实施工作和经费管理等。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一般是由上级政府提出工作目标、方案和思路,并逐级传达、强力推行,同时提供保障机制、监控实施过程、评价实施效果,将考核结果纳入下级部门或单位政绩考评或物质奖励的重要依据。^⑦我国义务教育“政府主导、分级管理”的体制是在发展变化中逐步形成的: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事业,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2001年《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新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应当“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中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以法律的形式对义务教育管理体制进行规定,实现了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从“以乡镇为主”到“以县为主”的转变,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的领导力和凝聚力,全面推进大规模的义务教育变革。例如,2011年和2012年

教育部先后与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署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其后各省级政府又和辖区内市级或县级政府签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责任书,对不能如期通过验收的县级部门的相关领导实行免职,将本省份确定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任务和责任层层分解、逐级落实,从而构建了中央和地方共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长效机制。^⑧

(二) 协同一致,合力攻坚

我国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体现在义务教育上就是集中各方力量发展义务教育,即凝聚主要力量,协同一致、合力攻坚。义务教育改革发展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和配合、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普九”是一场持续时间长、参与人数多、自上而下的国家工程,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很多地方的党政主要领导靠前指挥,对这项举国的工程予以高度重视。教育、财政、发展改革等部门明确职责,合理分工,协调配合。”^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义务教育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学校、社会力量、广大人民群众等对教育的热情被充分调动。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纷纷打出了“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口号,有钱的掏钱,有力的出力,有物的捐物^⑩,实现了“人民教育人民办”,为打赢“普九”攻坚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教育部联合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开展多项义务教育专项治理活动也是协同一致、合力攻坚的真实写照,如巩固义务教育普及成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治理义务教育择校难题、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相关部门纷纷出台配套方案,确保重点突破;在具体落实层面,地方、学校因地制宜,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路径,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经验。如在控辍保学方面,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的要求,以及边境地区稳边固边和边境群众子女入学需求,采取“边境一线校点全部保留”、“城乡教师互换讲台”、学生上学“零负担”等措施,增强义务教育办学吸引力,控辍保学,严防边境地区农村空心化,固疆守土,成效显著^⑪;西藏浪卡子县中学积极落实义务教育普及与巩固的要求,探索西藏高寒边境牧区送教下乡确保“控辍保学”模式,对民族地区乃至广大农村地区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这些典型经验的涌现就是政府、学校、家长及社会协同一致、合力攻坚取得的成果。

(三) 实事求是,渐进变革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义务教育发展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差异较大,教育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从实际国情出发,我国在推进义务教育

发展过程中采取了因地制宜、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原则。^⑫如在普及义务教育方面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国家明确要求“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并依据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状况 把全国划分成三类地区 分别做出相应要求、部署 这一工作思路促使三类地区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区域内义务教育发展 推进了“普九”的实现。进入 21 世纪 我国进一步遵循实事求是原则 有计划、有步骤地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又如在推进义务教育公平发展方面 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体现“效率优先”原则 鼓励一部分“重点校”先发展起来。随着 2000 年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后 关注重点逐步转向教育公平 更加注重“均衡发展” 2005 年教育部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 将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作为工作的重点。当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基本均衡”以后 2017 年 教育部关于印发《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的通知 关注点再次转向“优质均衡”。可以说 中国义务教育领域里的重大举措都是先试点、再推广 分步实施、稳步推进的。这种实事求是、渐进变革的策略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是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少走弯路的重要保障。如江苏省泰州市全面实施“基本均衡—优质均衡—全域均衡”三步走战略 走出了一条内涵式发展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之路：一是“名校+”模式 推动城乡一体快速融合；二是“互联网+教育”的泰州微课探索；三是“5+2”评价模式 核心素养进中考。推进泰州特色素质教育 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⑬

二、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

尽管中国义务教育还在发展之中 改革也远未结束。但纵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历程 不难看出 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国模式呈现出一些基本特征 具体而言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性与时代性兼具

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国模式的凝练需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历史性是指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国模式的概括和凝练是基于 40 年来义务教育的发展历程 而不能脱离这个史实。改革开放 40 年来 中国在义务教育发展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尝试 这些改革都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的补充和完善 并未彻底否定原有的基础；成就与经验的总结也是基于对历史的继承与发展 都离不开前期的积累。时代性则是指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国模式还应与时俱进 体现时代发展的要求 兼具时代使命和时代特征。如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关注的重点是“有学上”；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 人们对优质教

育资源的诉求日益迫切 关注的重点从“有学上”转向“上好学” 这说明我国义务教育发展重点随时代发展而不断调适 提炼出的模式的内容及特征也应随着关注重点的转变而变化。

（二）特殊性与普遍性并行

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国模式体现出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共存的特征。特殊性是指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国模式有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模式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尽管历史上我国曾借鉴欧美、苏俄等国家的教育经验和模式 但由于国情不同 收效甚微 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国模式是对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理论总结 体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 具有其特殊性。普遍性是指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国模式是在长期探索过程中形成的符合教育规律的发展模式 这一模式与他国模式都遵循着义务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 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相同的情况或面临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模式”的提炼对国外 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 对沿线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义务教育的发展具有普遍的借鉴价值 如英国系统引进中国数学教育“上海模式” 不仅是基础教育数学教材的引入 更是将中式课堂教学、教师培训、教育理念“三位一体”的全方位引入。

（三）稳定性与发展性共存

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是一个相对稳定而又动态发展过程。我国义务教育采取渐变式变革的方式 许多教育教学改革的实施都是分步实施、稳步推进 这种渐变式变革决定了义务教育中国模式的稳定性与发展性。稳定性是指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国模式是对一定时期内义务教育发展经验及方式等的总结 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义务教育的全部内容 但这一模式一旦提炼出来 就应该是相对成熟和稳定的 短时间内不会变化。发展性是指“中国模式”只是一种对中国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阶段性的理论概括 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一个随着义务教育实践推进而动态发展的过程 随着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纵深发展，“中国模式”的研究会更加深入、细致，“中国模式”的内容也会发生转变 并被赋予新的内涵。

三、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国模式的重要成就

改革开放 40 年来 我国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总结和梳理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国模式的重要成就 对增强自信、推进我国义务教育更快更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解决了“穷国办大教育”的世界性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百废待兴。党和国家始

终坚持让更多人接受教育的理念,针对高文盲率、低入学率的国情,审时度势提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积极调动国家、地方和群众办学力量,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穷国办大教育”的道路。“穷”是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用于发展教育事业的经费总量十分有限,生均教育经费非常低。调查显示,1975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教育经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是:美国7.6%,英国8.2%,法国5.0%,西德6.4%,日本6.5%,苏联9.0%,而我国1978年教育经费仅占国民收入的2.09%。^⑭从生均教育经费来看,到2000年我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时,全国小学、初中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分别为491.58元和679.81元,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大”是指我国义务教育学龄人口众多,而普及程度较低,义务教育发展任务艰巨。“大”和“穷”是一对矛盾,办大教育要花大钱,可以说我国需要用有限的公共教育资源办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⑮在此形势下,政府积极探索推进“穷国办大教育”的进程,逐步建立起健全、有保障、有质量的义务教育体系。随着教育的不断深化,政府逐步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高位,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也在不断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逐年上升。据统计,2001—2010年我国公共财政教育投入从约2700亿元增加到约14200亿元,年均增长20.2%。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首次超过4%,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且之后的每年比例均保持在4%以上。教育投入的增长为创造性解决“穷国办大教育”的世界性难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用25年时间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壮举

全球范围内,主要发达国家完成普及初等教育的时间分别是:德国125年(1763—1888年)、法国92年(1833—1925年)、美国67年(1852—1919年)、英国48年(1870—1918年)、日本35年(1872—1907年),全面普及义务教育所花费的时间则更长。从1986年到2011年,占世界1/5人口的中国用25年时间,实现了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宏伟目标,对于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可不谓之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壮举,这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⑯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正式确立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掀开了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新篇章。为了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法》落实,国家先后颁布《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关于在90年代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经过15年的不懈努力,到2000年年底,全国2541个县级行政单位通过“两基”验收,全国85%以上

的人口地区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⑰“200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⑱与此同时,还有不少中西部地区尚未完成“两基”任务,一些完成地区也还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强调“‘十五’期间,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坚持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扩大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范围,初中阶段入学率达到90%以上,青壮年非文盲率保持在95%以上。”通过近10年的攻坚克难,2011年我国小学毛入学率达到104.2%、小学净入学率为99.8%、初中毛入学率为100.1%,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用25年的时间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壮举,创造了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普及教育的成果惠及亿万中国家庭,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三) 义务教育总体发展水平正逐步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长足发展,我国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成效显著,已完成从“穷国办大教育”到“大国办大教育”的转变,目前正积极致力于向“大国办强教育”的华丽转身。从普及与巩固方面来看,2015年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95%,超过了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94.54%,中学毛入学率94.30%,超过了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93.13%;^⑲2017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3.8%,并继续保持稳步增长趋势。从师资条件方面来看,2015年世界中高收入国家的小学、中学生师比平均值为18.54、14.78;G20国家的小学、中学生师比平均值为18.63、15.54,我国小学、中学生师比平均值为17.05、15.14,我国小学阶段的师资配比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并超过G20国家平均水平,中学阶段师资配比优于G20国家的平均水平。^⑳从教育质量方面来看,我国义务教育减负提质效果明显,目前,中国义务教育已走向世界,影响力持续攀升:如英国教育部来华学习和借鉴上海数学教学模式,引进上海数学课本、教师用书及教辅,签署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美国田纳西州访沪学习教研组制度;受国家商务部委托,中南出版传媒集团邀请国内顶级团队编写南苏丹小学数学、英语、科学教学大纲、教材及教师用书,创新国家援外新模式;2009年和2012年上海市参加了OECD组织实施的PISA测试,数学、科学、阅读均排名第一,2015年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四省市参加了PISA测试,数学、科学、阅读成就分别排名第6、第10和第27,学生成绩虽有所下滑,但仍名列前茅,超过不少发达国家城市。历史和数据已经充分证明,我国义务教

育迅猛发展,义务教育总体发展水平正逐步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差距在稳步缩小,并且在部分指标上已实现反超。

四、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国模式的反思与展望

反思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40 年历程,要求我们必须辩证、理性地认识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国模式。毋庸讳言,中国义务教育已经探索出一条“穷国办大教育”的成功路径,用事实证明了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国模式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审时度势、清醒意识到中国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尚存在一些不足与亟待改进之处,如义务教育经费仍显不足、法律法规落实不到位、均衡发展问题仍多、教育质量亟待提高等。新时代,发展中国义务教育的重点在于根据时代要求,结合国际义务教育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要求,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一) 继续将义务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竞争,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显。”^①新时代,教育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需要继续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及各行各业的高素质人才,以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高点提供智力支持,促进我国人口重负转化为人口红利,提高综合国力。义务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基础,对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来看,现在的青少年儿童,在未来几十年的建设当中,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会成为社会建设的中间和骨干力量。虽然近年来国家对义务教育经费投入逐年增加,但人均教育经费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区域、城乡、学校差距仍大。有鉴于此,应将义务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巩固义务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重中之重的位置,优化顶层设计,加大对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多措并举,大力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城乡及校际差距,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奠基。

(二) 完善义务教育配套法律法规,依法治教

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是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是依法治教的重要前提。早在 1986 年,全

国就颁布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翻了义务教育依法治教的新篇章。随着义务教育的深入发展,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使义务教育逐步朝着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有效保证了义务教育各项工作的稳步推进。与此同时,我国的义务教育法制程度与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义务教育实践中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仍然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校外培训班顽疾加重学生课业负担问题、民办教育集团化发展导致义务教育阶段收费过高问题、义务教育拔尖创新人才缺少有效的选拔和培养机制问题等;不少地方和学校存在法律法规执行不力、流于形式的现象,如未能严格落实对辍学的义务教育学生家长进行罚款、拘役;再加上监管不严,严重制约着义务教育的法制化水平和现代化进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依法治教是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是提高学校治理法治化、科学化水平的客观需要,是维护教师、学生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为此,第一,针对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亟需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第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大教育行政执法力度,依法维护学校、学生、教师的合法权益;其三,加快推进依法治校,完善学校内规章制度,深入开展相关的法制宣传教育,形成浓厚的学校法治文化氛围,切实推进义务教育法治化进程。

(三) 深化并落实公平与质量并重的发展理念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要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公平是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是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质量是学校和教育的生命线,是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追求的重要目标。“公平与质量并重”是指既要促进义务教育的公平发展,也要着力提升义务教育的整体品质。^②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新的矛盾反映到教育上,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资源需求和当前优质教育资源发展不平衡及总量不足之间的矛盾,其本质就是“人民更加追求高质量的、公平的教育”,可见,“公平与质量并重”已成为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应有之义,也将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坚持的重要发展理念。为此,需要进一步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育新时代中国好教师^③,以减负提质为重点,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切实提高教育质量。同时,要强化政府统筹规划,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着力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确保老少边穷地区的学生也能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四) 转变政府职能 构建现代学校治理制度

毋庸置疑,强有力的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我国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40年历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但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是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健全统筹有力、权责明确的教育管理体制。以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为重点,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提高公共教育服务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当前,不少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对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师资配置和学校课程设置等多方面进行了过多行政干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学校的办学自主性及特色化发展。我国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亟需在尊重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的前提下,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扩大义务教育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建立基于我国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校本管理、自由参与、民主监督的现代学校治理制度;积极倡导学校探索并建立以法人治理结构为主的现代管理机制和模式;吸引家庭、社会等多元力量参与、监督、评价学校教育。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国模式。

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国模式是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总结与凝练,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对“一带一路”沿线及其他国家具有一定的启示和积极的借鉴价值。借鉴“中国模式”切忌照搬模式本身,而应立足于本国国情,抓住义务教育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关键,淡化形式、注重实质^④,在充分挖掘这一模式的优势和特点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探讨落地实施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最终转化为适合本国义务教育发展的实际行动。

注:

-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②苏星鸿《“中国模式”三题》,《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 ③郝立新、卢衍昌《中国模式的哲学意蕴》,《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
④张西立《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两篇】中国模式的特质及其意义》,《新华文摘》2009年第15期。
⑤董必荣《面向21世纪的中国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⑥杨东平《关于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江苏高教》2001年第1期。
⑦⑩石鸥《中国基础教育60年:1949-2009》,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页。
⑧西南大学评估组《义务教育第三方评估情况》[EB/OL]. (2016-11-26).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5n/xwfb_151126/151126_sfcl/201511/t20151126_221196.html.
⑨⑫王定华《中国义务教育改革发展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教育科学》2013年第4期。
⑬⑭宋乃庆、李森、朱德全《中国义务教育发展报告2014》,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8、318—319页。
⑮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北京国民经济基本情况资料汇编》,1981年,第394页。
⑯王文源《中国民办教育: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⑰柳海民、王澍《中国义务教育实施三十年:成就、价值与展望》,《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4期。
⑱袁贵仁《中国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⑲翟博《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中国教育报》2012年9月9日。
⑳㉑田慧生、邓友超《让十三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十八大以来教育质量提升的成就与经验》,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9、83页。
㉒习近平《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人民教育》2014年第19期。
㉓刘贵华、张伟《论区域教育的中国经验》,《大学》(研究版)2016年第3期。
㉔宋乃庆、罗士琰、肖林《新时代中国教师培育刍议》,《中国大学教学》2018年第7期。
㉕陈重穆、宋乃庆《淡化形式,注重实质:兼论《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数学教学大纲》》,《数学教育学报》1993年第2期。

(责任编辑:云 浅)

(下转第39页)

The Impact of Microfinance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China: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Microcredit Companies

Qi Hongqian & Li Zhichuang

Abstract: Microfinance is the main means of reducing poverty, but whether microfinance can reduce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still needs further study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different regions. Basing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2010 – 2016 of microcredit companies in China, this paper builds a panel smoothing threshold regression (PSTR) model to identify the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pact of microfinance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Furthermore, this paper uses the mediator effect model to examine the mechanism of microfinance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e result shows that, microfinance has played a better role in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However, the degree of this effect gradually weakens as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tinues to improve.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is kind of weakening is related to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of formal finance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related to the commercial nature of microcredit companies seeking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Therefore,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y related to microfinance 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we should adjust the policy emphasi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of microcredit companies in various regions.

Key words: microfinance; urban-rural income gap; PSTR model; mediating effect model

(上接第 30 页)

Chinese Model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n Compulsory Education for 40 Years

Song Naiqing & Luo Shiyan & Wang Xiaojie

Abstract: The model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n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China is a very worthy but controversial issue in academic research. It is an embodiment of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it refers to the relatively stable and mature developmen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has been gradually formed dur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n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China over the past 40 years. Its connotation includes government leading and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multi-party coordination and joint efforts to tackle hard problems, an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gradual reform.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y and times, particularity and universality, and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Recalling the process of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n compulsory education over the past 40 years, leap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China has been realized; the worldwide problem of “running large-scale education in a poor country” has been explored and solved; the feat of popularizing nin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has been completed within 25 years; the overall level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s gradually approaching the level in world’s medium-developed countries, and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Reflecting on the model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n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China, it should continue to give the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put it on the strategic position, increase investment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promot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perfect the suppor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administer compulsory education according to law, deepen and implement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equal emphasis on equity and quality, transform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construct modern school governance systems.

Key word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n compulsory education; Chinese model